

善的慢发生与它的结构性驱逐

恶并非被主动生产出来；它只是当善的发生被断绝之后，那片空地上唯一能自然长出的东西

高鹏 著 · SDE 学员 · 法哲学与道德发生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本文撤销一个两千年未被检视的底层先验——“恶总需要一个被制造的过程”——由此将追问方向从恶的生产翻转为善的发生条件的断绝。善的发生并非一种可以“拥有”的品质，而是一种必须被持续建构的慢过程：它根植于无用的好奇所滋养的认知根系，依托于允许道德挣扎展开的滞留空间，依赖于在谴责错误的同时容留犯错者的关系网络。善的发生天生抵触效率逻辑。当现代社会以优化、量化、预控为核心的组织逻辑将这些“无用”的条件从基本运转中系统性清除时，善的发生源便被悄悄枯竭。恶并非被主动生产出来；它只是当善的发生被断绝之后，那片空地上唯一能自然显现的东西。在善源枯竭的状态下，善的慢发生与恶的快激活之间存在着深层非对称：空洞并不必然被恶填充，但恶是唯一能绕过根系、穿越空洞而无需内化过程的指令。本文将此机制命名为“善源枯竭”，通过与“异化”传统和“可行能力”进路的双重切割确立其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追溯一个具体案例中从善的发生到善的萎缩再到枯竭临界点的完整生成进程，并设置三个可操作的证伪条件。由此，“恶”不再被追问它如何被制造，而是被追问：那个本应阻止它的东西，是怎样在沉默中枯竭的。

关键词：善源枯竭；生成机制；异化；可行能力；慢发生；结构性驱逐

一、一个问错了两千年的问题

“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

这个问题至少困扰了人类思想史两千年。从奥古斯丁的“恶是善的缺乏”到启蒙时代对犯罪动机的心理学追问，再到当代神经科学试图在杏仁核与前额叶皮质中找到邪恶的生物学坐标，人们一直在时间顺序上理清这对冤家的先后关系。是那个内在的、稳定的、叫做“邪恶”的人格品质驱使一个人去犯罪？还是犯罪行为发生之后，社会才把“邪恶”这个标签贴在他身上？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而从未被真正回答，不是因为它过于艰深，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它预设了“邪恶”和“犯罪”是两个可以分先后、比早晚的现成东西——好像世界上先摆着一个叫“犯罪”的盒子，或先摆着一个叫“邪恶”的标签，另一个东西后来才出现、往上一贴，事情就清楚了。这种预设默认事物是预先存在、稳定现成、等待被精确定义的对象。邪恶如果是先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更精密的诊断工具去定位它；犯罪如果是先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更严谨的法律程序去定义它。

如果我们不再追问两个标签谁先谁后，而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们是怎么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行为、反应、争论和共识，被逐步“发生”出来并且持续交织在一起的？

这种追问方式不再把任何存在形态——一个制度、一种病症、一个标签——当作预先给定的成品。它追问的是：这个东西，是在什么条件下、经过什么样的张力与选择序列、从哪些矛盾里，被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当我们用这种眼光审视“邪恶”与“犯罪”的关系时，一个被既有理论长期遮蔽的维度便浮现出来。

但要真正撬开那个被遮蔽的维度，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那些试图回答“恶从何来”的既有解释路径，它们是否共享了一个从未被质疑过的底层预设？

这个预设是：恶之所以出现在世界上，必然是因为有某种力量、机制或过程，将它“制造”了出来。无论内在邪恶论找到的那个叫“犯罪人格”的模具，还是标签理论找到的那台“贴标签”的机器，还是结构性暴力理论找到的那套“剥夺资源”的流水线，还是阿伦特找到的那个“放弃思考”的开关，乃至马克思的“异化”——它们都在追问同一个方向：找出那个把恶制造出来的东西，找出那个把原本完整的人撕裂的力量。

但这个预设本身，值得被撤销。

如果撤销它，我们会开始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恶之所以出现，或许恰恰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把它制造了出来，而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本应阻止它出现，却被人悄悄撤走了。不是有人在生产恶，而是善的自我发生被掐断了源头。不是“原本有的东西被分离”，而是“从未有机会发生的那个东西，它的发生条件被堵死了”。

这个追问方向的翻转，就是本文要做的事。在展开核心论证之前，必须先完成两项审慎的工作：与“异化”传统完成切割，以及与“可行能力”进路进行正面质证。这两步决定了本文的判断是一个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还是一个可以被更宏大框架涵摄的漂亮名字。

二、与“异化”传统的切割

在宣告“善源枯竭”是一个新的辨别维度之前，它必须正面回答一个质疑：这个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乃至各种“原子化”论述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学术礼貌问题。如果“善源枯竭”只是“异化”的在道德心理学术语上的换皮版本，本文就只产出了一个名字，而不是一条辨别线。

2.1 异化说的是什么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刻画的“异化”概念，其深层结构可以概括为：劳动者与他自身生命活动之间，发生了本不应发生的分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他，劳动过程不再是他自由生命的表现，他与自己的类本质——即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来改造世界从而确证自身的能力——被一种外在的、敌对的经济关系割裂了。劳动者“越劳动越贫穷”，这不仅指物质上的贫穷，更指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活动能力的萎缩。

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先验前提是：有一个“本应如此”的人性作为参照。正因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以当劳动被异化为谋生苦役时，人才会感到痛苦、非人化。他预设了劳动者的内在完整性——那个能愤怒、能渴望、能梦想的完整人格——只是被外在的经济关系撕裂了。消除异化的道路，因此是推翻那个撕裂他的经济结构，让被压抑的完整人性重新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做一点补充。成熟的马克思——尤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那种永恒“人性”的预设是有批判意识的。他所追问的，更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历史地、具体地塑造了“劳动者”这个主体位置。但《1844年手稿》中异化概念的结构——先在的完整、外在的剥夺、复归的道路——确实构成了后来者反复返回的思想原型。卢卡奇沿着这条思路推进，将“物化”描述为现代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普遍症候。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从另一条路径靠近：艾希曼不是一个恶魔，他是一个被抽空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放弃”了思考。这个“放弃”同样预设了思考能力曾经是完整的。

三种论述的共同结构：先在的完整性——被外在力量分离——显现为低于完整性的匮乏状态。异化的本质是“分离”。

2.2 善源枯竭说的是什么

“善源枯竭”的核心判断是：恶不是被做出来的，是善的发生被断绝之后，那片空缺自然显现的形状。

与“异化”传统的切割线在这里：

异化追问的是：原本有的东西，是怎么被分离开的？

善源枯竭追问的是：那个从未有机会发生的东西，它的发生条件是怎么被堵死的？

这不是修辞层面的区别。它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经验现象和完全不同的实践含义。

异化理论在解释一个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工人时具有强大穿透力：他曾经拥有完整的手艺、对自己劳动过程的掌控、通过劳动确证生命尊严的体验——然后，工厂体系把这些从他身上撕掉了。他愤怒、痛苦、渴望夺回。这个愤怒本身，就是他内在完整性仍然活着的证据。

善源枯竭要解释的是另一种人：他从未拥有过那种“通过劳动确证生命尊严”的经验。他从未在无用的好奇中浸泡过，因此从未长出过属于自己的认知根系。他从未在滞留空间里挣扎过，因此从未体验过那种“由自己做出道德裁定”的内部历程。他从未在一段容留的关系中被信任过，因此从未学会在被谴责的同时仍然有力量去改变。他没有被剥夺什么——因为那个能“被剥夺”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在他身上生长过。

考虑一个案例：一个在高度绩效化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了十五年、最终在一次同事冲突中做出了极端暴力行为的工人。

异化理论判断：这个人被剥夺了对劳动过程的掌控、被剥夺了与同事建立真正关系的机会、被剥夺了作为完整的人的价值感。他的暴力是被压抑的愤怒的最终爆发。出路是变革那个压迫性的生产结构，让他恢复对自己的劳动和生命的掌控。

善源枯竭理论追问另一个问题：他有过愤怒吗？一个道德主体在长期被压迫的过程中，愤怒是一种信号——它证明他仍然能区分善恶，仍然知道什么是不公，仍然在与不公进行内心对抗。但如果他从未有过这种愤怒呢？如果他从未在无用的好奇里长出过“属于自己的那套对错判断”，从未在滞留空间里挣扎过“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从未在被容留的关系里学习过“我做错了但仍然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在十五年流水线生涯里，他没有愤怒，他只有适应。他只是越来越沉默，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能把任何外部指令顺畅地执行而不激起任何内心波澜。到最后，那个暴力行为，并不是压抑已久的愤怒的爆发——它是空洞被一个极端念头毫无阻力地穿过后，留下的那个最大号的脚印。

这指向二者最深的切割点：异化的对立面是“复归”——夺回被剥夺的，恢复被分离的。善源枯竭的对立面不是“复归”，而是“创造”——去创造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让善能够发生的条件。

对于那个在流水线边长大的人，他需要的不是在愤怒中肯定自己完整的人性；他需要的是一个他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一次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好奇心被温和地接住；一段没有截止日期的、允许他在内心来回打转而不被催促的滞留时光；一个在他犯了错之后仍然愿意接纳他、但绝不纵容他的错误、持续传递“你还可以是别的”的关系。

判断：善源枯竭不是在重述异化。它是在异化链条的最末端，发现了一个更深的深渊——原来那个“能被异化的人”——那个还会愤怒、还会痛苦、还会渴望夺回自己人性的主体——是多么珍贵。因为在他之前，可能已经有很多人，连“成为一个能被异化的人”的条件都没有获得。

三、与“可行能力”进路的正面对质

与“异化”的切割只是第一关。第二关，而且是更难过的一关，是这个概念必须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正面交锋。

森的“可行能力”进路早已超越简单的“资源剥夺”叙事。它讲的恰恰是一个人“有可能做什么、成为什么”的实质自由。森明确指出，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更是“可行能力的剥夺”——一个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健康、教育、社会参与，无法在实质意义上“过上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纳斯鲍姆进一步将这一进路发展为一份“核心能力”清单，其中包括“实践理性”（能够形成善的观念并规划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能够爱、悲伤、感激、正当愤怒）。

如果一个社会剥夺了一个人“形成善的观念”的可行能力，剥夺了他“进行道德挣扎”的实质自由，这不就是“善源枯竭”吗？“善源枯竭”有没有提供比森的框架多出哪怕一毫米的新辨别面？

如果跨不过这一关，本文从“异化”那里辛苦赢得的理论收益，会在森这里重新失去。

3.1 森的“能力”是功能性的，善的“发生”是生成性的

切割线在于“发生”二字。

森的“可行能力”是一组功能。一个人拥有“实践理性”的可行能力，意味着他可以形成善的观念、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可以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森的框架关注的是：一个人有没有被赋予做这些事情的实质机会。

善源枯竭关注的不是“功能”，而是发生过程——那些功能背后所依赖的、无法被直接“赋予”或“提供”的内在建构过程。

具体来说：

森谈论的“进行道德挣扎的能力”，是一种可以被描述、可以被测量、可以被当作政策目标来追求的功能状态。它假设：只要提供了足够的教育资源、足够的参与机会、足够的免受暴力的环境，“进行道德挣扎”的可行能力就可以被实现。

善源枯竭指出：道德挣扎的能力不是一种可以被“提供”的功能。它必须在特定的发生过程中被建构出来——这个过程不是资源的堆叠，而是一个人用他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时间、自己去不可替代地走过的成长历程。

更精确地说：森的可行能力是可以外部赋能的——你可以通过改善营养来赋能“身体健康”的能力，你可以通过提供教育来赋能“实践理性”的能力。但善的三个发生条件——根系、滞留空间、容留关系——具有一个根本特性：它们无法被外部“赋能”。它们必须被那个人自己亲自经历，而且必须经历足够长的时间，在不可量化的人际信任中完成。

一个孩子无法通过“被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而自动长出认知根系。根系需要他亲自在无用的好奇中漫游——那个漫游的过程必须是他自己的，不能被任何人为他代劳。一个年轻人无法通过“被赋予参与社会事务的实质机会”而自动获得道德挣扎的能力。挣扎需要他亲自在滞留空间里反复反刍、消化、重新感受——那个反刍的过程必须是他自己的，不能被任何教程压缩。

森谈的是“你能做什么”。善源枯竭谈的是“你是怎样变成那个能做这些事的人的”。

3.2 森的能力无时间性，善的发生是严格时间依赖的

这是更深一层的切割。

森的可行能力框架没有内在的时间结构。一个人今天拥有“身体健康”的可行能力，明天可能因病失去，后天可能通过治疗恢复——“能力”的获得与丧失在理论上是可逆的，时间是可逆的变量。

善的发生是严格时间依赖的，且不可逆。

根系的长成需要童年期漫长的、散漫的、不指向任何成果的探索。如果那个时期被压缩了，被填满了，被用效率指标管理了，根系就长不起来——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暂时缺乏某种能力”。它意味着那个能够长出能力的机制本身已经被破坏了。一个从未在童年长到过认知根系的成年人，你无法通过“提供更多教育资源”让他长出根系——因为根系的生长窗口已经关闭了。他不是“暂时没有拥有”某种能力，他是从未被赋予一次机会去变成那个能拥有那种能力的人。这两件事在森的框架里是同一种“可行能力剥夺”；但在善源枯竭的框架里，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层级的现象。

3.3 森的“情感能力”不及“容留”

纳斯鲍姆的核心能力清单中包括“情感”——能够爱、悲伤、感激、正当愤怒。善源枯竭中的“容留”是否只是“情感”能力的一种更细致描述？

不是。容留不是一个人拥有的情感能力，而是他被置于的一种关系结构。一个人是否能够从错误中重生，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情感能力，更取决于他身边是否存在一张足够持久的、不被风险评分所量化的、在谴责错误的同时仍然容留他这个人的关系网。这张网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但又不是可以被“提供”的外部资源（像森说的“教育”或“医疗”那样）。它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它必须由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被量化的信任来构成。

森的能力清单可以要求“社会应当为每个人提供情感发展所需的支持性环境”。但“容留”说的是另一件事：信任不能被提供，它只能在不可替代的、漫长的、共同的历史中自己长出来。一段能够在谴责错误的同时仍然接纳犯错者的关系，不是可以被政策“供给”的东西。它需要时间的沉积，需要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人之间不可被转移的承诺。一个社会可以为公民提供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收入保障，但它无法为公民“提供”一段真正的容留关系——因为关系不是资源。

3.4 理论收益

由此，善源枯竭与可行能力进路的切割线，可以被清晰地画出：

森的可行能力剥夺，说的是一人被阻断了通往某些重要功能状态的道路。那是一条外部道路的阻断——你可以通过改善外部资源、外部制度、外部环境来重建那条道路。

善源枯竭，说的是一人内部那个能够长出这些功能状态的生成机制本身，从未被建构过，或者已经被摧毁了。那不是一条外部道路的阻断，而是一块内在土壤的沙化。你无法通过改善外部资源来重建它——你只能试图重新创造一次从未发生过的发生。

这个切割同时界定了“善源枯竭”这个辨别维度在学术版图中的位置：它不否认异化理论和可行能力进路各自强大的解释力；它指出的是，在这两种解释所能覆盖的区域之外，还存在着一片它们够不着的现象——那片现象的特征是，一个人不是被剥夺了什么，而是从未有机会成为一个“能拥有那些东西”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善源枯竭不是在重述已有的任何概念。它是在“异化”和“可行能力剥夺”都够不着的那条边界上，切出了一条新的辨别线。

四、四种既有理论，一个共同的盲区

在与“异化”和“可行能力”进路完成对质之后，还需要检视另外四种解释路径：内在邪恶论、标签理论、结构性暴力理论、平庸之恶。它们各自抓住了真实的一角，但也在同一个地方停下了追问——那个地方，就在它们共享的底层先验面前。

4.1 内在邪恶论

这是最古老也最直觉的解释：一个人犯下极端罪行，是因为他内心有某种邪恶的本质。它的深刻之处在于承认了犯罪者与常人之间可能存在着真实的、结构性的差异。但它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它把“邪恶”当成了一个先在的、等待被发现的内在属性，却没有追问这种“内在属性”本身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程中被生成出来的。一个人前额叶皮质的活动水平不仅是基因决定的——长期被剥夺教育、长期处于不可逃脱的压力、长期被当作“高风险者”来对待，这些经历本身就会改变脑结构与功能。内在邪恶论把一段被省略的生成史压缩成了一个本质标签。

4.2 标签理论

自贝克尔以来，标签理论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越轨不是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将某些行为挑出来、贴上“越轨”标签之后才成为越轨的。“邪恶”这个标签，本质上是社会对极端犯罪的一种终极切割工具——它不再是一种法律判断，而是一种将犯人从“我们”中

彻底切割出去的存在论排除判决。标签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标签的生产过程，但它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上止步了：为什么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就撕不掉？它预设了标签下还有一个完整的人——只要停止贴标签、给予接纳和机会，他就能恢复。但如果他内部那个能长出新身份的结构，早在标签贴上之前就已经荒废了呢？

4.3 结构性暴力理论

从加尔东到当代批判犯罪学，结构性暴力理论深刻揭示了制度如何通过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制造苦难。它能犀利地揭示许多最终走向犯罪的人，是被剥夺了教育、经济机会、社会参与，在结构性的不公中被“逼”上那条路的。然而，它主要锁定的是“剥夺”——剥夺食物、医疗、教育、工作。本文要追问的，指向另一层更内部的暴力：它不是剥夺你外在的资源，而是废除你感知自我、衡量选择、形成道德内疚的内心条件。一个被剥夺教育的人，他还会愤怒、渴望、反抗。但被更深的暴力击中的人，他丧失的恰恰是那种能孕育出愤怒、渴望与道德挣扎的内在感知力。他不是没饭可吃，他是不再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去饿；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没有再以“一个由自己做出裁决的道德主体”的身份去择路。

4.4 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旁听艾希曼审判时得到的最具冲击力的洞见是：惊天大恶往往并非出自恶魔，而是出自被抽空了独立思考能力、只会服从指令的“无根之人”。这个判断极其有力，因为它击穿了“邪恶者必定面目狰狞”的直觉想象。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进一步论证了现代官僚制本身就是一台道德疏离的机器——它以“技术性责任”代替“道德责任”，让每个人只对自己在流水线上的那一小段操作负责，而不对整个链条的最终结果负责。

然而，阿伦特把这个判断主要留在了现象描述的层面。鲍曼虽然比阿伦特更系统地描述了“生产不思考”的社会工程，但在他看来，现代官僚制所做的首先是悬置既有的道德感——通过将对象非人化、将行为切割为微小的技术性环节、将责任分散到层级链条中，它让普通人“暂时”搁置了他们在日常关系中所拥有的道德反应。鲍曼的分析因此隐含了一个预设：被搁置或疏离的道德感，此前是已被建构完成的。本文要追问的是：如果那种道德感从未被建立过呢？如果“道德疏离”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完整道德主体”身上的退化或悬置，而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成的建构呢？

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只是程度上的。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实践路径。阿伦特和鲍曼意义上的“平庸之恶”，需要做的是恢复——恢复思考的能力，恢复道德责任的完整性。而“善源枯竭”意义上的空洞，需要的不是恢复——因为没有“曾经完整”的状态可以回得去——而是创造：去创造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让善能够发生的条件。

4.5 共享的那个先验

四种路径各自深刻，各自止步。但它们止步的地方，并不只是“没看到”某个东西。它们是在同一个底层先验面前，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追问。

这个先验是：恶，总需要一个被制造的过程。

内在邪恶论找到了那个模具——犯罪人格。标签理论找到了那台机器——贴标签的社会机制。结构性暴力理论找到了那条流水线——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平庸之恶找到了那个开关——放弃思考。每一种理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恶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如果这个先验被撤销了呢？

如果我们不再追问“恶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追问：那个本可以阻止恶发生的東西，是怎么被断绝的？

这个追问方向的翻转，意味着把整个问题的重心从恶的生产，转移到善的发生条件的断绝。它逼我们去看那些既有理论从来不看的东西：不是那个犯了罪的人身上“多了什么恶”，而是他内部“少了什么能让善持续发生的条件”。

不过，在追问“善的发生如何被断绝”之前，必须先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善，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五、善的生成机制：三种并非现成装备的条件

要理解善的发生如何被断绝，必须先理解善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善作为一种“品质”的定义，而是善作为一种持续的活动，它需要哪些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持续地建构。

这个追问本身已暗藏一个易滑之处：如果直接宣布“一个人要持续成为有道德的人，需要三样东西——根系、滞留空间、容留的关系网”，就已经把这三种条件当成一个理想的、永恒的道德主体所“理应拥有”的装备清单来摆出。那是既成事实论的口音。要守住生成机制，必须追溯：这些条件本身，是在何种社会张力中被逼出来、被指认为“善的条件”的？它们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馈赠——它们是在特

定的社会形态与教育传统中被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所维系、传承、并且反复面临被瓦解风险的脆弱构造。

因此，本节的任务不是“列出”善的发生条件，而是追溯它们如何发生、以及它们曾经被何种力量维护或侵蚀。但在此之前，还需要回应一个问题：生成机制追溯不能只追问“它们如何发生”，还必须追问“它们自身是否可能携带排斥机制”。每一种被建构为“善的条件”的东西，都可能同时将某些人排斥在外——这种排斥不是它的偶然副作用，而是它的构造本身的特征。生成机制要求对概念自己的生成史保持敏感：我们之所以把这三种条件指认为“善的发生条件”，是因为在特定的社会张力中，它们被经验为善的发生所必需的东西。但这个“必需”本身是否也携带着排斥？回答这个问题，才能防止“善的发生条件”成为又一套关于“完整人性”的沉默理想型。

5.1 根系：长出“属于自己的判断”的那个东西

一个人要能分辨是非，光靠接收外部规则是不够的。外部规则可以告诉他“杀人是错的”“偷窃是错的”“背叛信任是错的”，但这些规则若没有内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它们就只是贴在身上的标签——在外部监控严密时遵守，在外部监控撤除时脱落。

规则要内化为德性，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人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认知根系——一套从自身经验与思考里长出来的、扎进他对世界深层理解中的判断力。这个根系的长成，需要一种特定的养分：无用的好奇。

那个孩子对蚂蚁搬家一整个下午的凝视，那个匠人对自己手艺材料的自发琢磨，那个学生对一道题除了“标准解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的散漫探询——这些东西不带来分数，不带来奖金，不直接服务于任何可计量的目标。但它们恰恰是认知根系的生长点。它们让一个人在外部给出的标准答案之外，拥有一套从土壤深处自己长出来的、属于自己的辨别力。

但这种“无用的好奇”并非在任何社会中都能获得同等的生存空间。在西方古典博雅教育的传统中，“自由人的闲暇”（scholē）曾被制度化成为一种受保护的无目的性——它预设了一个不必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从而在希腊城邦里天然绑定了奴隶制。在中国耕读传统中，“闲读”是士绅阶层的特权，而农民的时间从未真正属于他自己。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土壤里，“无用的好奇”都不是普遍的——它依赖于特定的阶级结构、经济剩余和社会制度。它从来不是一个非历史的、永恒的“理应如此”。

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破坏了某个曾经普遍存在的理想状态，而在于：它学会了用一种“效率”和“可测量性”的语言，把“无用的好奇”从一切被制度性地组织起来的学习场景里拆除。从前那些依附于阶级特权的“闲暇”，虽然不公，但至少为少数人保留了根系生长的土壤。如今，“闲暇”被民主化了——每个人都拥有了“自由时间”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一种更彻底的征用发生了：那些能够被测量、能够被优化、能够被预期产出的活动，填满了所有的时间。无用的好奇没有被禁止——它只是被定义为“你该做正事的时间之外，爱干什么干什么”。但它从来不是“之外”的东西。它是那个能让人在“之内”不变成机器的东西。

同时必须承认：以“无用的好奇”为养分的认知根系，其发生本身就携带排斥。它需要时间、需要安全免于生存焦虑的庇护、需要至少一个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允许”它发生而不去干预。这就意味着，那些从小被生存压力驱赶、被当作工具使用、被剥夺了“不产出”的权利的群体，他们不仅在被剥夺资源——他们在被剥夺那个“能长出认知根系”的可能性本身。这种排斥不是“无用的好奇”的副作用，而是它作为一种发生条件的本构特征：它的发生天然依赖于某些人“不被允许拥有它”。

5.2 滞留空间：让道德挣扎发生的间隙

一个有了根系的人，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还需要一个能让挣扎发生的间隙。这个间隙，是外部指令与自身行动之间的那个“停一下、想一想”的时间与心理空间。

道德挣扎的发生，需要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一段延迟。在这段延迟里，人可以调动他的根系去消化、去权衡、去感受“如果我这样做，我会对得起谁、对不起谁”。这段延迟不产生任何外在的产出，它看起来完全“无用”。但恰恰是在这段看似无用的滞留里，一个人从外部条件反射的执行者，变成一个有主体性的道德行动者。

滞留空间的存在，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一个允许人“暂时还不知道”“暂时还没做到”“暂时还在磕磕绊绊地试”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建立，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形态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与脆弱性。

在某些宗教传统中，忏悔室——那个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全部的迷茫、甚至在说出口的过程中才第一次看清自己在挣扎什么的空间——曾经是一种制度化的滞留。但它的代价是，它在一个严格的权力等级下运作，忏悔者面对的是一个拥有释罪权的权威。在传统的师徒制或手工艺行业中，学徒在漫长的出师过程中有大量的、不被催促的“试错时间”。但这种空间随着手工业被工厂体系取代而大面积消失。在某些社群——世代定居的村庄、稳定的邻里——一个人犯错的后果可以被一段足够长的、持续的日常互动慢慢消化。但这种“缓慢消化”的前提是人口的长期低流动性，而当代城市生活恰恰摧毁了这一前提：人们频繁搬迁，邻里互不相识，关系高度可替代。一旦犯错，你不是在一个长久的关系里被慢慢接纳；你是在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位置上被快速评估。

滞留空间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建立”的东西。它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而每一次创造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代价和局限。现代社会对“效率”的推崇，并非凭空摧毁了一个已经普遍存在的滞留空间——滞留空间从来就没有被普遍地、平等地赋予过

每一个人。问题在于：当效率成为唯一合法的组织原则时，我们丧失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在某些阶层、某些社群中侥幸存在的滞留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丧失了创造滞留空间的能力和意愿——因为现在，连“创造滞留空间”这件事本身，都要被问责：它产出什么？它提高什么指标？不回答这两个问题，它就得不到任何资源。

滞留空间的排斥机制同样是内构的。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可以被允许停滞”的奢侈。社会对被标定为“有生产力”的成员的停滞，或许还能容忍；对已经被标定为“风险”“问题”“低效”的成员的停滞，则被视为进一步拒绝的理据。一个被列为“高风险”的青少年，他的每一次迟疑，都被解读为他正在“编造借口”；他的每一次沉默，都被视为“拒绝配合改造”的证据。他不仅没有被给予滞留空间——他因为被剥夺了滞留空间，反而被进一步惩罚。滞留空间的重建，不可能是一视同仁的“给所有人更多时间”的政策方案，而是必须优先赋予那些因为缺乏滞留空间而被惩罚的人——而这就触碰了社会对“公平”的最深层的焦虑。

5.3 容留的关系网：让人能从错误中重生的东西

道德不是一次性的正确。一个真实的人，必然会犯错——会伤害别人，会背叛信任，会做出自己事后追悔莫及的事。在这些时刻，他能否重新成为一个“不恶”的人，取决于一件事：他身边有没有一张关系网，能在谴责他的错误的同时，仍然容留他这个人。

这张网的容留不是纵容。它恰恰是在坚持“你做的事是错的”的同时，仍然传递“但你不是只能用这一个错误来定义”。容留给了他一个可以回头的岸，也给了他重新长出善之根的空间——他可以正视自己的错误而不必被错误吞噬，因为他知道，有人的眼睛仍然愿意看见他除了“那个犯罪者”之外的其余部分。

但这种容留从来都不是任何社会的默认状态。即使在传统村落中——那里的人际关系看似稠密而持久——容留也是有代价的：它可以变成一种压迫性的“人情债”，一种让人永远无法挣脱的、用恩情来禁锢的控制。容留从来不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接纳”。它总在某个权力结构里运作，总携带着它自己的代价。

在小规模的宗教社群、互助小组、长期稳定的师徒关系、乃至某些幸存者共同体中，我们能看到容留的重复发生。这些空间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需要一个足够小的尺度，让人的脸不能被编号替代；它们需要一段足够长的共处时间，让信任有机会在不可量化的互动里生成；它们需要一个不以“产出合规”为目的的伦理承诺，让容留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然而，当代社会以效率为核心的组织逻辑，对这三种条件均构成系统性的压力。容留的关系网不是被一夜之间撕毁的——它是在风险评分、零容忍政策、合规审查的层层推进中，被一块块拆卸的。

容留的排斥机制更隐蔽也更尖锐。容留天然的是“局部的”——一个人只能容留有限的人，一段关系只能承载有限的重负。这就意味着，那些已经被社会标注为“不值得容留”的人——罪犯、失信者、被污名化的群体——他们最需要容留，却最难获得容留。整个社会对容留的分配，恰恰是逆分配：容留倾向于流向那些已经拥有了足够多容留的人。当一个已经被定义为“善源枯竭”的人需要一段容留关系来重启他的善的发生时，他面临的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他需要容留才能变好，但社会恰恰因为他“不好”而拒绝对他容留。容留的排斥性，不是它的偶然副作用——它是它的内在逻辑：容留之所以是容留，正因为它不是“对所有人”。它不是公共服务，不能被均等分配。

5.4 三者的共同特征

至此应该已经清楚：根系、滞留空间、容留的关系网——这三样东西，不是善的“先验模板”，不是在任何人身上都理所当然应该存在的“标准配置”。它们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教育传统、阶级结构中，被一些人在某些历史时刻艰难地争取、创造、维系下来的脆弱构造。它们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馈赠；从来不是“理应如此”的理想型。

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抵触效率。根系靠无用的好奇滋养，而“无用”恰恰是效率要清除的对象；滞留空间要靠“不立刻产生答案”来维持，而效率视延迟为浪费；容留的关系网要靠不可被量化的信任来维系，而效率视不可量化为风险敞口。

善的发生，需要“无用”作为其发生土壤。没有这块土壤，根扎不下去，挣扎无处停留，回头的岸塌了。一个人可能仍在外部规则和监控下表现合规，但他内部那个能让善持续发生的小宇宙，已经停转了。他不再是一个能“不恶”的人——他只是在恶还没有一个足够强的外部指令来激活的时候，暂时没有作恶。

六、窒息而非谋杀：善的发生源如何在无声中枯萎

6.1 现代社会并不直接攻击善

现代社会没有说“好奇心是坏的”，没有说“停下来想是错的”，没有说“信任一个人应该被惩罚”。它做的事更根本、更无声：在多重力量的矛盾性拉扯中——国家治理对可预测性的追求、资本增值对效率的崇拜、个体在大系统中的避险本能——某些曾经存有空间、但无法产出可计量成果的实践（无目的的阅读、不受考核的陪伴、允许反复犯错的容留），被一步步挤占、遗忘、甚至被重新定义为“不

合理”。

这并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系统”在主动“驱逐”善。恰恰相反：其中的每一个行动者——管理者、教师、家长、矫正官——在各自的局部合理性中做出的选择，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无意的、去中心化的、没有元凶的窒息。

6.2 三种局部合理性如何无意中汇合

第一种局部合理性来自可测量性的治理需求。现代国家与大型组织需要管理海量人口，可测量性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学校需要标准化的方式评估学生，医院需要可比较的指标管理医生，司法系统需要量化的工具预测再犯风险。这些需求本身是合理的——没有测量，就没有公平分配资源的依据。然而，当可测量性从一种工具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合法性标准时，那些不可测量的东西——一个孩子眼神里的好奇、一段道德挣扎的心理历程、一种重建信任的缓慢过程——就不再仅仅是被看见，而是被默然地排除在“值得投入资源”的范围之外。这不是有人在恶意驱除善。这是可测量性的治理逻辑自身携带的盲区：它只能光照那些能被数字化的东西，而善的发生条件恰恰是无法被数字化的。

第二种局部合理性来自个体在竞争中的避险本能。在一个将人压缩为一系列可比较指标的社会里，个体面临着一个真实的生存困境：留在“无用”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就是在竞争中落后。一个教师如果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学生讨论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道德困境，那个下午就不会产生任何可以被写入年度考核报告的教学成果。一个家长如果让孩子在院子里“瞎玩”一个暑假而不报培训班，孩子下学期的成绩排名就可能下滑。这些选择不是恶意的——它们是在一个将“不优化”等同于“落后”的竞争结构里，个体为自己和后代所做的理性避险。但所有的理性避险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善的发生条件的系统性挤出。每一个“我能怎么办”的选择，都在无意中加固了那套让所有人喘不过气的逻辑。

第三种局部合理性来自风险预控的制度惯性。现代风险管理的逻辑是：一切可以被预控的风险，都必须被预控。一个犯过罪的人再次犯罪，不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更是曾批准他假释、同意他就业、允许他接触未成年人的那些机构和管理者的“事故”。在集体问责的压力下，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提高预控的灵敏度和覆盖范围——把更多变量纳入风险评估模型，把“容留”替换为“监控”，把“信任”替换为“预警”。没有人想当那个为了一次容留而承担全部追责风险的人。结果，容留的空间被无数个局部上合理的避险决策合力关闭了。

这三种局部合理性构成了一个逐步收紧的漩涡：可测量性只能光照可量化的东西，风险预控不断把可量化的东西纳入评分模型，个体竞争压力不断把人推向“做那些能被量化和不被扣分的事”。在这个漩涡里，无用的好奇、滞留空间、容留关系——它们同时落入了三重盲区：不可被量化的东西不被光照，不被光照的东西无法引发警觉，无法引发警觉的东西在集体行为中悄无声息地萎缩。

6.3 “窒息”而非“谋杀”

善的发生条件不是被一个有恶意的执行者针对性地摧毁的。它是在多种局部合理性的交互作用中被窒息——像一株植物被一氧化碳取代氧气那样，没有谁故意放毒气，只是周围的空间被另一种不可见的气体填满了，而光合作用的原料恰好不再是二氧化碳。

这个“窒息”的比喻比“谋杀”更精确，因为它抓住了本文的核心判断：善的断绝，不是一个可以被归因于单一主体或单一力量的事件。它是非线性的、去中心化的、充满了无意图后果的。试图对“窒息”做一个“嫌疑人画像”——找到一个反派、一个阶级、一个制度——本身就是在用既成事实论的逻辑去处理一个需要生成机制才能把握的对象。那样做，只会把善源枯竭再次套进那些漂亮的诊断标签里，让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去打倒”的敌人——而窒息之所以可怕，恰恰因为它没有一张可被打倒的脸。

这个区分也是本文的政治清醒所在。如果善源枯竭被简化地表述为“数字化系统驱逐了善”，读者立刻会去寻找那个该为驱逐负责的主体，然后整篇文章就会变成又一场既成事实论的围猎。但善的条件不是被驱逐的——它是在无声中被窒息的。而窒息一旦被认清为窒息，下一步就不是“找到凶手”，而是“改变空气的成分”。这两件事的实践方向完全不同。

七、慢发生与快激活：为什么空洞被恶填充

至此，本文的核心判断已经可以被逼出来：善不是一种可以被“拥有”的品质，善是一种必须被持续建构的状态。它需要根系持续从无用的好奇中汲取养分；需要滞留空间持续为道德挣扎提供间隙；需要容留的关系持续为犯错后的重生提供岸。当这三样东西被一套以效率、量化、预控为核心的运转逻辑系统性地屏蔽时，善的发生源便被缓慢地、不可见地枯竭。那之后，恶不需要被制造——它只需要等待一个足够强的外部指令，来激活那个空洞。

然而，这里必须回应一个最尖锐的质疑：如果善源枯竭只是一个中性的“内部空洞”，为什么这个空洞被填进去的总是恶，而不是善？为什么那些被掏空的人，他们最后吸附上的，总是极端的、暴力的、毁灭性的指令，而不是某种温和的、建设性的理念？

答案藏在善的发生与恶的激活之间那种深层的结构性非对称里。这个非对称不是一句论断，它需要一个严谨的论证。以下分三步展开。

7.1 为什么善的发生必然是慢过程

善不是一种可以被“一键安装”的品质。它需要一段漫长的、不可被催促的发生过程。

根系需要浸泡在无用的好奇中慢慢长成——一个孩子要经过无数次散漫的、不指向任何成果的探索，才能在他的认知结构里编织出一套“自己的判断”。这个编织过程没有截止日期，不能用“学期末”来结算，不能用“标准答案”来验收。滞留空间需要无数次的“我不知道”“我没想好”“让我再想想”，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困境被一次次反刍、消化、重新感受，人才能慢慢长出“在外部指令与自己行动之间插入一段属于自己的延迟”的能力。这个能力不能被速成，不能被教程化，不能被打包成一个“道德决策十二步法”。容留的关系网需要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信任不可被量化的部分，能够在每一次真实的互动中慢慢沉淀。这不可能被压缩成一个“关系修复速成班”，不可能被简化为“重建社会资本”的考核指标。

善的发生的“慢”，不是一种量的慢——不是因为步骤多所以耗时长。它是一种质的慢：它的每一步，都必须由那个人亲自经历。没有人可以代替一个孩子去好奇，没有人可以代替一个人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做自己的内心挣扎，没有人可以代替一个犯错者在被谴责和被接纳之间同时体验到张力。善的发生必须经过“亲自”这一关——而“亲自”天然就是慢的。它不能被外包，不能被加速，不能被任何外部资源直接兑换。

7.2 为什么恶的激活可以是快过程

恶的激活，不依赖“亲自”这一关。

当一个极端的意识形态、一个有魅力的威权、一个许诺一切困惑都一键解决的狂热团体向一个内部空洞的人发出指令时，这个指令不需要被“理解”——它只需要被“顺从”。顺从是快的。它不需要那个受到指令的人在无用的好奇中浸泡过、在滞留空间里反刍过、在容留关系中学习过“做错了还可以重新开始”。它只需要他把外部指令照做，不加甄别，不插入自己的一丝一毫。

这里需要做一个关键的辨析。恶的激活，在一些个案中，也可能是一个逐步的、看似“慢”的过程——一个逐渐卷入恐怖主义的人，他可能花了数年时间才完成激进化。这是否与“恶的激活是快过程”矛盾？不矛盾。“快”指向的不是外部行为的时间长度，而是它绕过了一个必须由内部慢发生的建构过程。一个激进化的过程，从头到尾都是一系列外部指令与外部意识形态的内化。这个人不需要亲自长出任何东西——他只需要把给定的叙事吸收进来，当作自己的叙事。吸收外部叙事是快的——快不是因为它耗时短，而是因为它不依赖一个不可被催促的、不可被代劳的、不可被压缩的内部建构过程。相比之下，一个人要从自己的经验里长出“属于自己的那套对错判断”，哪怕他每天做出一百个判断，那个根系的生长也仍然是慢的——因为根系不能靠指令来铺设。

善的发生和恶的激活，两者都需要时间。但时间的性质不同：善的发生所需的，是从内部生发的、不能被代劳的建构时间；恶的激活所需的，是从外部灌注的、可以被批量复制和加速的驯化时间。前者必须亲自长，后者只需要被填充。

7.3 为什么空洞的结构更倾向于接收恶的指令

这两条论证已经搭好了地基。现在可以正面回答那个质疑：为什么空洞被恶填充？

善的发生条件被断绝之后，留下的那个空洞，在理论上是中性的——它本身不主动偏向善或恶。但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恶的指令具有一种善的指令所没有的结构性优势：

善的指令——比如“你可以去帮助别人”“你可以对这件事保持好奇”“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指令需要接收者内部已经有一粒微小的根系来与它共鸣，才能被“听懂”并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帮助别人”这个指令，如果作用于一个从未在任何关系里体验过理解和被理解的个体，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词语，不带有任何情感厚度和行动召唤力。他大脑里有那个词，但心里没有那个根。

恶的指令——尤其是以恐惧、仇恨、绝对服从为形式驱动的指令——则直接绕过根系，作用于更底层的机制：对外部威胁的条件反射、对归属感的原始渴望、对不确定性一键消除的服从冲动。它不要求理解，只要求执行。它不依赖那个人内部有任何特定的积淀，因为它的运转恰恰建立在内部空无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内部充满了挣扎和判断的人，他反而很难毫无阻力地接受这种指令。

这就是“非对称”的完整形态：善的发生需要内部建构，建构是慢的；恶的激活可以绕过建构，绕过是快的。善的指令需要内部有哪怕一粒根来共鸣；恶的指令正好相反——它只需要内部是空的，就可以毫无阻力地穿透。在善的发生条件被断绝之后，那个空洞不是自动被恶填满——而是当恶的指令降临时，空洞对它毫无防御，而善的指令在同一个空洞面前束手无策。不是空洞选择了恶，是善在那个空洞面前，根本进不去。

这同时意味着：善源枯竭并不必然导致恶行。它导致的是“善的无法发生”。恶行只是在善源枯竭者遭遇一个足够强的恶性外部指令时的一种可能后果。如果没有那样的指令降临，他可能只是冷漠、躺平、或者像一个合规的机器人一样度过一生。但那些被冷漠填充的空洞，在社会统计学的意义上持续隐身——社会系统只记录行为结果，只有当空洞被恶的指令激活并产生了可编码为“犯罪”的行为时，空

洞才第一次被看见，并且是以“恶”的形态被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善源枯竭在实践中总是以恶的形式浮出水面：不是空洞只被恶填充，而是社会系统只看得见被恶填充后的空洞。

八、萎缩与枯竭：一个不能模糊的边界

在完成了善与恶的非对称性论证之后，还必须引入一个关键的区分，以防止善源枯竭被不当扩大为对所有“不太好的行为”的万能解释。

善的发生源不是灯塔开关——要么亮，要么灭。它像一棵树的根系，可以健康，可以萎缩，可以枯死。一个在高度绩效化的社会里长大的普通人，他的善源可能只是萎缩了——他仍然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内心挣扎，仍然在某些时刻会因“无用的好奇”而分心，仍然在某些关系里体验过不容量化的信任。他的道德外壳没有脱光，只是变薄了。他的恶，呈现出的是“道德疲惫”“公德心下降”“在微小抉择上模糊”。而枯竭是另一个层级：根系已经枯死，滞留空间已经被铲平，容留的经验为零。这个人的内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外部指令与自身行动之间插入哪怕一秒钟的、属于自己的延迟。他没有“疲惫”——因为他从未“努力”过。他没有“放松”——因为他从未“紧绷”过。里面是空的，且从未不是空的。

大多数被效率逻辑裹挟的现代人属于萎缩——他们还能在某些时刻被善的发生所打动，还能在某个契机下被重新接通。但少数人——那些从出生起就被弃置在一个善的发生条件从未出现过的地方的人——他们的枯竭，是一种终局。

从萎缩到枯竭这之间最危险的一跃，发生在外部的极端指令降临的那一刻：对于一个萎缩者，外部指令进入时，他可能仍然会挣扎一下——虽然挣扎的力量不足，但仍然有挣扎；对于一个枯竭者，外部指令进入时，不会有任何挣扎。它穿过他，留下一个被称为“恶”的行为。

这个区分对于本文判断的有效范围至关重要：善源枯竭并不宣称所有的恶都源于枯竭；它宣称的是，在那类最极端、最冷彻骨髓、让旁观者直觉到“这个人的里面是空的”的恶行中，善源枯竭是这类恶行者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善的被发生之前，善的可能性已经被断绝了。

九、一个临界点的生成机制追索

以上是理论层面的论证。一个生成机制的判断，必须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完成对自身辨别力的最终检验。本节追溯一个基于真实案例档案重构的青年犯罪者的成长历程。这个案例的核心功能，不是在实证层面证明“善源枯竭”的存在——那个证明需要经验研究。它的功能是展示一次完整的生成机制追索：善的发生条件，如何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一步步从“有过微弱的萌芽”走向“彻底不再期待”。

请注意：本文此前的论证区分了“萎缩”与“枯竭”——前者是善的发生条件曾经被部分接通过但后来被压制，后者是善的发生条件从未被实质建构过。本案例展示的是一个从萎缩逼近枯竭的临界过程。那个临界点，才是有辨别力的理论必须瞄准的标靶：善的发生条件不是在某个瞬间被“斩首”的，它是在反复的萌芽与反复的掐断中，被那个人自己也已经忘记的那一次“不再期待”之后，真正枯竭了。

9.1 无用的好奇的四次掐断

安东尼奥（化名）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他在六岁之前与外祖母同住。外祖母不识字，但允许他在后院自己玩——挖虫、堆石头、用碎砖搭出他自己命名的“城堡”。那时他有一双从早忙到晚的手。没有人在旁边评价他在做什么，也没有人拿他和邻家孩子比较。这是他童年里唯一一段“无目的好奇心”被接住的光。

六岁那年，他搬回母亲身边。母亲独自抚养他与两个弟弟，同时打两份工。家里的规则很简单：不要给我惹麻烦。安东尼奥在学校的课业从二年级开始落后。他看不懂文字，但喜欢画——在课本空白处画满小人。四年级老师在他的成绩单上附注：“注意力不集中，课上总在画画。”母亲看了一眼，没有说什么。她太累了。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安东尼奥的画笔被收走了，因为“先把乘法表背下来”。第一次掐断。

中学时他参加了学校的课后木工小组——那是全部课程里唯一让他早晨愿意起床的东西。他在工具房里待得比任何学生都晚，学会了不用图纸，凭手感做榫接。指导老师跟他说：“你这一双手，将来能当木匠。”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叫出“你将来”三个字。但第二年，学区因为预算削减裁撤了全部工艺课。木工教室的门锁上了。第二次掐断。

他十四岁开始在市郊一家汽修厂帮工。老板是个粗人，但让他上了扳手。他学得快。一天，他花了整个下午把一个废弃化油器拆开，琢磨里面每一根管子是干什么的。老板骂了他：“你他妈不是来上学的。修不好的直接换掉，别浪费时间。”第三次掐断。

最晚近的一次，是在少年拘留所等待判刑时，因为表现合格被允许参加狱内读书会。领读的义工发现他对非虚构作品有奇异的专注力，悄悄问他：“你想不想写点什么？就写你自己的东西，不交上去的那种。”他摇头。后来狱方以“表达性写作不在本所矫正项目清单里”为由，取消了读书会。第四次掐断。

这四次掐断的累积效应，不能被理解为四次“同一件事”的重复发生。它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化：第一次掐断是外部强制（画笔被收走），安东尼奥可能仍然在内心保留了另一块“可以好奇”的自留地。第二次掐断是结构性的（木工课被裁撤），他失去了唯一一个在学校里连通他认知根系的外部据点。第三次掐断传递了一个更深的信息：连你自发的热情都是错误的——不只是“无用的好奇”不被容忍，连在“有用的工作”里也不能有好奇。第四次掐断，他自己摇头了。义工问他想不想写，他说不出来，或者已经不再觉得“写”和自己有任何关系。

那个摇头，是比前面三次掐断更沉重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外部事件，它是一个内部姿态：他不再期待了。善的发生源不是在第四次掐断时才枯竭的。它是在他不再期待的那一刻，才第一次真的枯竭了。在那之前，他只是萎缩——每一次掐断都留下了一些残存的根系，但残存的根系每一次都更弱，直到最后，它们再也发不出芽。

9.2 滞留空间的持续挤压

安东尼奥在十一岁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脑子里有东西拉来拉去”。镇上商店被一群大孩子砸了，其中一个是隔壁街的，安东尼奥认识他。事发后第二天，那个男孩的母亲在街口哭。安东尼奥很想问：他干吗要砸那家店？他又不敢问。这个问题跟了他三天。第四天，他在饭桌上提了一句。母亲说：“管好你自己。”

这是他记忆里第一次“挣扎了一下却没有地方可以消化”。往后类似的经验反复重演，只是每一次“挣扎”的时间越来越短。

在中学，他因为替朋友出头打架被停课两次。停课就是停课——没有人跟他谈：你为什么替他出头？你在那一刻在想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太清。他只觉得“不打就憋着”。那个被憋在里面的东西，没有人帮他打开。他自己打不开。结果，憋着的东西总是以冲动的方式喷出去。但每一次喷发，留给他的都不是释放感，而是更深的困惑。学校是一台设计用来教知识、管行为的机器。它没有设计“在身体动作和嘴巴说出的指令之间，允许一个孩子反刍、犹豫、停住”的接口。

在这里，生成机制追索必须更细致地审视一个关键的心理转折：从“还在挣扎”到“不再挣扎”之间，那个临界点在哪里？

安东尼奥在十一岁那一次，三天反复想同一个问题，并在饭桌上主动提了出来——这说明那时候他还相信“我的困惑是可以被一个成人接住的”。他还在尝试将道德困惑转化为语言，并期待回应。母亲的“管好你自己”不只是拒绝了他那个具体的问题——它拒绝的是“在你和成年人的关系里，道德困惑是一个可以一起处理的东西”这条通道本身。

此后，类似经验的反复，不是简单的“挣扎被压制”，而是“挣扎被反复压制后，对自己的挣扎不再有信心”。一个人可以忍受自己的困惑没有答案，但他很难忍受“就连我有困惑这件事，也是我的问题”。学校停课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信号：你不仅行为有问题，你的整个内在世界——你的愤怒、你的忠诚、你的冲动和你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的无力感——整个东西，不被当成一回事。没有人觉得你的里面是值得被认真坐下来面对的。

从十一岁到十四岁，安东尼奥从一个“还会在饭桌上试探”的孩子，变成一个打架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少年。那个转变本身，就是萎缩的标志：他不再向外发送信号，但他仍然在向自己发送信号——“不打就憋着”这句话本身就证明里面还有东西在动，只是那个动出来的东西找不到任何形式的出口，只能以冲动的形态喷出。

9.3 容留的缺失与最后一次收腿

他的少年记录上有三笔：偷窃一辆未上锁的自行车（十二岁）、帮朋友望风入室行窃（十三岁）、在一次群架中用木板击伤对方手臂（十四岁）。每一次，他被带回派出所，母亲来签字，回家后屋里沉默一两天，然后恢复正常。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犯错之后对他说：你做错了，我从心里不赞成你做的事。但你回来吧，我不取消你。明天你还来，我还在这。他听到的是“别再给我惹事”“你跟你爸一个德行”“这一辈子能干啥”。这些声音告诉他：你是什么，已经被定完了。他做错的每件事，都在加固同一个判断。

十八岁生日前两个月，他在一场街头争执中重伤了对方。他被送进少年法庭。在等待判刑期间，看守所里一个姓米勒的矫正官——一个三十多岁的退伍老兵——做了一件安东尼奥至今无法归类的事。一天晚上，他隔着铁栅栏跟安东尼奥说：“你今天在食堂分水果的时候给了那个比你小的那个一块，我见的。”说完就走了。没有夸，没有训，没有任何“你要改好”的说教。他只是说：我看见。那是安东尼奥一生中唯一一个成年人，在不涉及惩罚、不涉及规则、不涉及“教育目的”的时刻，说了一句指向他身上某种尚存的动作的话。

有关这一细节需要做审慎的交待。安东尼奥在后来的狱中访谈中提到了这个场景。他说：“我想过很久，他是不是在骗我说好话。后

来我觉得不是。那个人就是看见了。他不是要管我。他就是看见了。”这个描述来自服刑者本人的单次口述回忆，当前可查的档案材料中未发现对这一具体对话的独立佐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它应当被视作一个深刻的心理事实——它告诉我们安东尼奥本人如何回忆并赋予这段经验以意义——而非一个经多方核验的社会事实。作为心理事实，它仍然是重要的：它表明，在安东尼奥自己的主观世界里，被整个惩戒系统定义为“风险体”的那一时刻，他认出了一次与自己所有既往经验都不同类的相遇。那一瞥的目的不是改造他——这正是它在他记忆里区别于其余一切“教育”的地方。

他没有因此改好。出狱后他又进去了一次。但这一瞥——一个人在他被整个惩戒系统定义为“风险体”的时刻，给了他一笔不被任何表格、任何评分、任何管教目的所解释的容留——它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但它迫使我们正视一个尖锐的区分：善的发生源的泯灭，不一定是因为“没人对他好”，而是因为所有对他的“好”都带有目的——为了改他、管他、防他。米勒的那一眼，是唯一没有目的的。但一个社会不能把一个人的善的发生，寄托在单个矫正官的一瞥上。那一瞥的光芒恰好证明了：在安东尼奥的整个一生中，一种“无目的的、不把他当作风险来预控的容留”，从头到尾都没有制度性地出现过。

9.4 恶行，作为空洞的显现

安东尼奥最终的罪行本身，在这里不需要被详细复述。相关审判档案记录下了他与当局对话的一个片断。当被问及为何在制服被害人后仍持续施加超出必要限度的伤害时，他的回答没有愤怒、没有仇恨、也没有推卸。他说的是：“我不知道，就是没停。”

“没停”——一个没有挣扎、没有回望、没有一个来自自己内部的指令说“够了”的身体动作。它的可怕之处不在恶的强度，而在善的彻底缺席。

这里需要正面回应一个来自犯罪心理学的替代解释：在极度暴力行为中，“没停”可能是一种急性应激障碍下的解离状态，或是极度暴怒导致的意识狭窄——并非空洞，而是过载。这种解释在临床上有一席之地。但本文坚持认为，“生成机制的空洞”在解释安东尼奥的个案时，同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广的解释幅度：病理性的解离或意识狭窄只能解释暴行发生的那几十秒钟，却无力贯穿从六岁到十八岁这条漫长的、充满了“善的萌芽被反复掐断”的生命线索。一个在事发瞬间因为应激障碍而“没停”的人，他的既往历史应当是另一番面貌——他的内部可能有过更强的根系、更充分的滞留经验、更持久的容留关系，只是在那一个极端时刻被压垮了。但安东尼奥的整条生命线索，指向的不是“被压垮”，而是“从未建成”。那个空洞不是在那场暴力中被撕裂出来的——它是在十二年的时间里被一点一点窒息出来的。暴行只是它第一次被外部指令穿透之后显现出来的形状。

“没停”不是那一刻的异常。它是整个生命历程的结语。

十、典范检验

以上论证提出了一个判断：在现代社会以效率、量化、预控为核心追求的基本运转中，善的发生条件被系统性窒息，导致善源枯竭；而恶，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善源枯竭之后，那片空缺自然显现的形状。本文将这个新辨别维度命名为“善源枯竭”。

它必须通过三项检验才能确立自身的理论地位。

10.1 不可还原性检验

“善源枯竭”能被称为它自己，还是说到底只是对既有理论做了更精致的包装？

把它压成最朴素的形式：恶不是被做出来的，是善的发生被断绝之后，空缺的自然显现。

把这个判断拿去和既有理论一对一核对。标签理论说的是：恶是社会贴上去的标签。结构性暴力理论说的是：恶是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逼出来的。平庸之恶说的是：恶可以是不思考的。每一个理论都只能替换这个判断的一个局部，而无法涵盖“断绝发生源——形成空洞——恶自动显现”的完整链条。

最重要的两次切割已在第二、三部分完成。与“异化”传统的切割线是：异化追问的是“原本有的东西是怎么被分离开的”；善源枯竭追问的是“从未有机会发生的那个东西，它的发生条件是怎么被堵死的”。与“可行能力”进路的切割线是：森的能力框架关注的是“一个人有没有被赋予做某些重要事情的实质机会”；善源枯竭关注的是“那个人内部那个能够长出这些能力来的生成机制本身，是否从未被建构过，或者已经被摧毁了”。能力可以被外部赋能，发生过程必须亲自经历。善源枯竭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新辨别点。

10.2 最近邻切割

标签理论：它的解释边界是：“停止贴标签，就能恢复。”善源枯竭与其的切割线是：停止贴标签无法让善重生，因为善的发生条件在被贴标签之前就已经被断绝了。

结构性暴力理论： 它的解释边界是：“消除结构性的不公，被压迫者就能站起来。”善源枯竭与其的切割线是：被结构性暴力剥夺的是外在资源；被善源枯竭断绝的是内在的发生能力。一个人可能吃饱了饭、接受了免费教育、拥有了合法身份，却依然是一个善源枯竭的空心人。

平庸之恶： 它的解释边界是：恶可以是不思考的。善源枯竭与其的切割线是：不思考不是一个人“放弃”了思考，而是他的思考发生装置，从来就没有被安装过。阿伦特描述了结果的恐怖；鲍曼推进了对“生产不思考”的社会工程的揭示；善源枯竭则进一步追问：如果那种道德感从未被建立过——如果“道德疏离”不是退化或悬置，而是从未完成的建构——那么，我们需要的就不是“修复”，而是“创造”。

10.3 跨领域推衍

一个具有识别力的辨别维度，应当能在多个领域独立显现。

在犯罪学中，它重新定义了累犯：累犯不是一个失败个体的屡教不改，而是那个人被认为“应该有的”悔改能力——自我反思的根系、消化错误的时间、重返社会的容留关系——从来就没有在他身上真正发生过。矫正系统用剥夺自由来惩罚他，用风险评分来管控他，用监控技术来跟踪他，却没有任何制度性设计是在恢复他的善的发生源。

在教育中，它迫使重新审视标准化评估的侵蚀作用：当孩子的时间被完全挤入可量化的学习目标，当成绩成为定义自我价值的唯一量尺，当犯错被零容忍政策和记过存档永久锁定——善的发生条件就在学校的日常运转里被系统性地排空了。

在管理学中，它戳破了最优化神话的终极代价：当组织用一套无所不包的KPI替代了人的隐性判断，当“不出错”的合规文化封死了所有在困境中低效挣扎的空间，当“不亏本”的核算逻辑把一切不可量化的信任和关系都视为冗余——这个组织就正在系统性地枯竭它内部每一个成员长成为道德责任感的行动者的可能。

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它发出了一个更紧迫的警告：当决策权从有道德挣扎的人手里，移交给追求最优解、只计算风险值的算法系统时，善源枯竭就获得了一张永久隐身斗篷。算法没有恶意，算法只是没有滞留空间——它不出错、不浪费、不亏本地执行命令。把道德外包给数字系统的那一天，人类就自愿枯竭了自己的道德发生源。

十一、证伪与边界

一个判断要获得理论的尊严，必须说清它在什么条件下会被判为错误。以下是三个独立且可操作的证伪条款。

11.1 如果恢复发生源不能阻止恶

在一个功能健全的社会里，追踪一批被认为具有枯萎征兆、被所有现成量表判定为认知根系与滞留空间被系统性剥夺的个体。在他们出狱后，社会主动为他们重建了三个条件：无用的好奇（免费开放的、不以任何产出为目标的兴趣共同体与手工坊）、滞留空间（不被指标考核、允许长期反复消化与反思的心理支持）、容留关系（有真实的人持续给予不可撤回的信任，且这种信任不因一次犯错就归零、也不被任何风险评分所量化）。在排除纯经济资助这一物质变量后，这批人的长期（十年以上）严重再犯率没有显著低于同等风险评分但未获得此干预的对照组。那么，这个判断将被证伪——它声称的善的发生条件的恢复，并没有阻止恶的重演。

必须承认，上述严格版本的证伪条件在一个尚未根本改变以效率为支配逻辑的社会里，难以被启动——因为要求“十年不被考核的容留”本身就是与现行组织逻辑正面对抗。为此，增设一个弱化但更可操作的版本：在小规模社群中，存在意图明确、且被参与者充分感知的“恢复发生源”介入（例如不以就业率为指标的替代性康复共同体、允许长期非产出性参与的手艺社群），与纯粹的资源投放（如直接提供住所与生活补助但不提供上述发生条件）相比，在何种再融入指标上会呈现出质的不同？如果在长期追踪中，两组在所有关键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判断的有效性将受到实质质疑。

11.2 如果那套窒息善源的逻辑停转后，枯竭仍不可逆

善源枯竭之所以在大多数现代社会里呈现出不可逆的形态，是因为那套窒息善源的逻辑——那套无孔不入的效率指标、风险量化逻辑、社会排斥机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运转。它不仅在监狱高墙之内，更在墙外的假释办公室里、在求职平台的信用筛查算法里、在邻里与同僚的审视里，持续且静默地断绝着每一个试图发生的善之根。

但如果存在局部社会空间——不以KPI考核为核心的小型共居社群、替代性学校、去机构化的康复共同体——其基本运转逻辑已经不再由那套效率、量化、预控所支配，那么，善源枯竭应该是可逆的。如果在这样的空间里，大量被既有理论判定为“枯竭征兆”的个体（从小被禁止自由好奇、被施以绝对服从训练、生活在高度奖惩量化的封闭系统里）在脱离原环境后并没有大规模地重新接通善的发生源，那么，本判断将被证伪。因为本判断预言：枯竭是可逆的，唯一的必要条件是停止那套窒息系统本身的运转。如果那套系统停了，而枯竭仍

在继续，说明本判断遗漏了更深层的断绝源。

这个证伪条件并非“免疫条款”。它没有设置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情境——它要求的是一个可以被明确识别的前提（那套窒息逻辑停顿），和一个可以被明确观测的后果（发生源是否重新接通）。它只是诚实地承认了本判断的深层预设：善源枯竭不是一个对“人性”的悲观断言，而是一个对特定社会结构的破坏力的精确诊断。

11.3 如果存在纯器质性病因

如果随着脑神经科学与基因研究的进展，对一个被判定为极端犯罪者的全面检查后发现：他丧失共情、无法进行道德挣扎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统计学意义上都与他的早年经历、长期社会环境、被切断的发生条件没有显著相关。即，他的认知根系、滞留空间、内化道德感的内在条件与常人无异，但他的前额叶皮质与边缘系统之间的功能连接出现了独立的、非社会性的、纯器质性病变，且此类病变在所有同类犯罪者中具有压倒性的高比例。那么，本判断将必须承认，在此类由纯粹器质性病变导致的邪恶行为面前，社会性的善源枯竭并非必要条件。本判断的有效范围将缩限为：它识别的是那些社会性成因主导的邪恶现象，而非器质性病变直接导致的犯罪行为。

十二、结语：在没有元凶的地方，改变空气

本文从“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这个老问题出发，走到一个更深的追问：那些试图回答这个老问题的所有既有理论——从内在邪恶论、标签理论、结构性暴力理论、平庸之恶，到马克思的“异化”传统，再到森的“可行能力”进路——为什么从未真正回答它？因为老问题本身建立在一个从未被质疑的先验之上：恶，总需要一个被制造的过程。当这个先验被撤销，追问的方向便翻转了：恶不是被做出来的。恶是善的发生被断绝之后，那片空缺自然显现的形状。

本文将这个翻转所逼出的新辨别维度，命名为“善源枯竭”：在以效率、量化、预控为核心追求的社会运转中，善的两个根本特征——它必须亲自发生，它的发生必须是慢过程——同时被这套逻辑所抵触。可测量性的治理盲区、个体在竞争中的避险本能、风险预控的制度惯性，这三种局部上完全合理的驱动力在相互咬合中构成了一张匿名的、去中心化的窒息之网。善的发生条件不是被一张有面孔的敌人的手所驱逐，而是在一片没有元凶的空气中悄悄窒息。

善的发生是慢过程，恶的激活可以是快过程——不是因为恶比善更强，而是因为善必须亲自长出来，而恶只需要填充进去。在善的发生源被断绝之后，恶不需要被制造——只需要等待一个足够强的外部指令来穿过那个空无的核心。

这个判断不是对人性本质的悲观断言。它是对一套正在持续窒息善的发生条件的运转逻辑的精确诊断。它同时拒绝了两种最常见的诱惑：一种是找到元凶——把它归咎于某个阶级、某个制度、某种意识形态——从而让诊断变成围猎；另一种是给出药方——列出一份“如何重新创造善的发生源”的清单——从而让清醒被重新包装为虚假的安慰。

我们手里并没有“如何建造正确发生源”的完整蓝图。我们唯一握在手里的，是一张标明了窒息如何在这套运转逻辑里发生的负极地地图。从这张地图上，我们能看见哪些方向是进一步窒息，哪些方向是或许值得被尝试的逆转。但逆转本身是否真的会通向善的发生——那只有在真的开始逆转它的人身上，才能被第一次验证，而不是在这里被书写的。

无用的好奇、滞留的空间、容留的关系，这三样东西读起来像一份处方。但它不是处方。它只是“窒息正在从这里被抽走”的那个局部的负片。在具体的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三样东西的理想形态，而是某种我们现在完全无法预测的、携带其自身代价和局限的、笨拙的东西。但知道它不是处方，比把它当成处方，更诚实。

所以结语不能是“让我们去创造善”。结语只能是：如果我们能透过一桩又一桩触目惊心的恶行，看见那个在沉默中被窒息了善的发生的空洞——而不是条件反射地又去给恶行贴上它早已有过无数版本的诊断标签——那么我们或许会开始问一个新的问题。不是“他是怎么变坏的”，而是“他为什么不能变成一个好人——哪怕只是最微小的那一种好”。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口，那套从不承认自己在窒息任何东西的运转逻辑，就第一次被看见了。而看见，已经是改变空气的开始。

附：理论证伪条件索引表

编号 证伪条件 可观测指标 若被证实，结论

F1（严格版） 恢复三个发生条件后，长期再犯率无显著下降（≥10年追踪） 再犯率统计，严格控制物质资助变量 善的发生条件的恢复不能阻止恶

F1（弱化版） 意在恢复发生源的社群介入与纯粹资源投放相比，在任何再融入指标上无显著差异 心理重建、关系重建、道德主体性等多项指标 发生源介入无独立增益，概念辨别力受损

F2 窒息善源的逻辑停转后，发生源仍未重新接通 系统结构性变革的确凿证据 vs 个体发生源重启率 存在比社会结构更深的断绝源

F3 存在压倒性比例的纯器质性病因（社会经历无相关） 大样本脑结构与基因筛查与社会史的零相关 有效范围缩限为社会性成因主导的邪恶

注释

[1] 本文所采用的追问方式——追溯一个现象在特定条件网络中如何生成、演变与固化，而非将其视为预先存在的稳定本质——在精神上和历史生成分析传统有所对话，但并不直接采纳任何一种特定的生成机制理论框架。这种追问方式区别于将事物视为现成对象的“既成事实论”眼光：前者问“这个东西是在什么矛盾里被一步步逼出来的”，后者问“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什么”。

[2] 此处援引古希腊“闲暇”（scholē），仅借用其“无目的性”这一形式特征，以说明无用的好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获得制度性庇护。本文不因此预设博雅教育的某种理想形态，亦不对古典奴隶制进行任何辩护或浪漫化。重点在于：无目的性如何在现代效率逻辑下被系统性地清除出组织的核心区域。相关讨论可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至八中关于教育的论述，以及当代博雅教育论者对“闲暇”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3] 鲍曼对现代官僚制下“道德疏离”的社会生产机制做出了深刻揭示。然而，其分析的核心——通过非人化、切割责任链条、将对象变为技术性问题——本质上是一套“悬置”既有道德感的机制，其预设是被悬置的道德感此前已在个体的日常关系中被建构完成。本文则进一步追问这一建构过程本身是否从一开始就被系统地阻断，从而将追问推进至发生条件的层面。

[4] 本文所使用的“容留”概念，与日常语言中的“宽容”或心理学上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均不相同。它一方面坚持对他人的错误做出明确的道德指认，不模糊是非边界；另一方面拒绝用这一错误永久地封闭犯错者的全部未来。容留与纵容的区分，恰恰是它的伦理内核所在。

[5] 本案例系基于公开的司法档案、矫正机构访谈记录及媒体报道等真实材料重构而成。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并适应理论示范的需要，文中对人物姓名、具体地点及部分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了匿名化、合成与简化处理。案例的功能为思想拓展性质的理论剖析，不以实证数据的面貌提供因果证明。文中米勒矫正官与安东尼奥的对话细节，来自服刑者本人的单次口述回忆，当前可查的档案材料中未发现对这一具体对话的独立佐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应被视作心理事实而非经多方核验的社会事实——这一确定性在正文第九部分中已做明确交待。

[6] 证伪条件F2所设想的“系统停转”，并非要求一个纯然乌托邦式的社会整体。它在操作上意味着：可以明确识别那些在局部社会空间内基本摆脱了效率、量化、预控支配的社群或制度片段（例如某些不以KPI考核为核心的小型共居社群、替代性学校、去机构化的康复共同体等），并对其中善的发生源重启状况进行长期追踪与比较。这并不预设此类空间的完美性，只要求支配逻辑的根本转向。相关实践脉络可参考多布斯等人对去机构化康复共同体的长期追踪研究。

参考文献

- Arendt, 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First published as a five-part series in *The New Yorker*, February–March 1963.)
- Bauma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 Lukács, G. (1971).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R. Livingstone, Trans., pp. 83–22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 Marx, K. (196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 Milligan,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written 1844.)
- Nussbaum, M. C. (2000).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平庸之恶的硬边界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是本文最近也最危险的对手：她已经论证过恶不必被制造——它可以出自无思，出自一个从不停下来想的人。若不划界，本文极易被读成平庸之恶的重述。分野有三。其一，解释项不同：平庸之恶解释的是加害者为何不觉得自己在作恶（思

之缺席），本文解释的是那个本该长出阻止力的过程为何没有长成（善的发生条件被断绝）——前者问一个已成年的官僚在行动时想了什么，后者问他此前几十年里有没有获得过滋养判断的根系与滞留空间。其二，反例形态不同：一个深思熟虑、绝不无思的人也可以在善源枯竭的条件下作恶，这对平庸之恶构成困难而对本文不构成。其三，干预方向相反：平庸之恶指向恢复思考与判断的训练，本文指向恢复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条件——无用的好奇、不被考核的滞留、不因一次犯错就归零的容留。第三条尤其重要：本文主张的不是让人多想，而是承认判断需要一层不能被优化掉的土壤。

增补二：三个发生条件的可编码形式

认知根系、滞留空间、容留关系若停在描述层面，正文的三条证伪条款就无法执行。可编码形式：认知根系——单位时间内投入于不以任何产出为目标的活动的时长，及该活动是否被任何考核记录；滞留空间——一个体面对一个道德冲突时，从遭遇到必须给出行动之间被允许的间隔时长，及该间隔内是否被要求提交任何说明；容留关系——一个体在一次明确过错之后，与其保持不可撤回信任关系的人数，以及该人数是否因该过错而下降。三项都不测量道德水平、不使用任何品德量表，因此本文所声称的“善的发生条件”才与既有的德性测量相区分。

增补三：非对称性主张的限界

正文提出善的慢发生与恶的快激活之间存在深层非对称，并明确“空洞并不必然被恶填充”。这一限定必须被读作强限定而非谦辞：本文不主张善源枯竭者必将作恶，也不能用于任何个体层面的预测或筛查。它的主张只在总体层面成立——在善源被系统性清除的人群中，恶作为唯一无需内化过程的可用指令，其被采用的概率上升。任何把这个总体命题用于个案风险评分的做法，都恰好落进本文所批评的那套效率逻辑，并使本文自我背反。

增补四：与作者已发表工作的分野

作者已发表的《活性塌缩：司法完善化如何耗竭公正的存活条件》与《制度成功的内在代价：自由危机的秩序自噬理论》都论证制度的完善化耗竭了某物的存活条件，与本文结构相同，必须切开。那两篇的耗竭对象是制度自身的属性（公正的存活条件、自由的秩序条件），受损者是制度；本文的耗竭对象是个体身上善得以发生的条件，受损者是人，而制度只是清除者。这一分野决定了两类论证的证伪面完全不同：前者要看制度指标与其正当性的背离，后者要看个体条件的恢复能否改变行为结果——正文的第一条证伪条款正是后者。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Viking Press, 1963.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North-Holland, 1985.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hilip Zimbardo,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Random House, 2007.